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

综合与重构

《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雷健坤 / 著

开明出版社

Kai Mi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 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9

ISBN 7-80133-487-6

I. 中… II. 中… III. 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704 号

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著者 雷健坤

出版 开明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号)

印刷 保定市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大32开 印张:6.875 字数:167千字

版次 2000年9月北京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3-487-6/I·23

定价 12.00元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历史转折中的艰难诞生	
一、社会转型	(5)
二、儒道争胜	(12)
三、淮南学术	(20)
第二章 文化专制前的最后呐喊	
一、遍采百家，杂家辨正	(34)
二、以道为归，集于大成	(46)
三、整合儒道，前后承转	(62)
第三章 贯通天人古今的理论重构	
一、“无为而治”是《淮南子》的中心思想	(77)
二、道：无为而治的形上根据	(84)
三、天：无为而治的天道论证	(100)
四、性：无为而治的人性论证	(111)
五、事：无为而治的历史经验验证	(129)
六、因：无为而治的现实开展	(138)
第四章 流传久远的绝代奇书	
一、《淮南子》与道家文化	(175)
二、《淮南子》与儒家文化	(186)
三、《淮南子》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192)
四、《淮南子》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	(199)
结束语	(208)
后 记	(211)

引 论

秦汉之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汉初统治者充分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恢复了民族的生机与活力。这一时期经济由衰弊转为繁盛，政权由分裂走向集中，文化由多元趋向统一，整个社会发生的种种巨变，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汉王朝不仅开创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治格局，而且也奠定了汉民族文化的基本性格与发展方向。任何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总是与其思想先驱们的理论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汉初的思想家们以超越自我的社会责任感，以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总结与吸收先秦以来的百家之学，以积极的姿态重构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淮南子》正是产生于这一转折时期的一部不朽之作。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编撰的。它是秦“焚书坑儒”之后出现的第一部文化总结性论著，同时又是汉“独尊儒术”之前最后一部体现学术自由的著作，因此，它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以其无所不包的弘富内容、贯通天人古今的庞大体系和独有的地方文化特质而彪炳于秦汉思想史册。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称其“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决非虚言。与汉代其他论著相比，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以某家自居，而是以“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的多元文化史观，对诸子之学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吸收和综合，从而实现了

汉以前文化的系统总结。它不仅再现了先秦子学不同学派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显示出各学派之间彼此关联交叉的密切关系，因此它对保存、传承和研究先秦文化有着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围绕如何看待《淮南子》遍采百家的特点，形成巨大的理论分歧。自东汉班固将其列入杂家，高诱将其归为道家，关于《淮南子》学派属性的问题便一直争论不休。清代以前“杂家说”占主导地位，清考据之风兴起，杂家说遭到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质疑，道家说遂又成为主流，然在以道家说内部中，又有老庄说（徐复观、金春峰）、道阴阳说（侯外庐）、神仙说（胡适）、杂家化的道家说（范寿康、范文澜、罗光、劳思光、戴君仁等）、新道家说（熊铁基、牟钟鉴）等，种种观点，不一而足。可以说，关于《淮南子》学派的杂道之分歧，迄今尚未得到解决；而对道家的不同理解，又进一步形成了对《淮南子》褒贬不一的评价。因此，对《淮南子》进行系统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对学界争议较大的“杂”与“杂家”、“老庄”与“黄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考辨，指出《淮南子》虽遍采百家但并非杂家。它是道家黄老之学的理论集大成者，鲜明地体现了以道为主，“兼名法，合儒墨”的综合性特色。然而，汉初黄老道家对诸子思想的吸收、综合，与先秦又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学术主要表现为儒道两大学派为争夺文化领导权，一方面“互绌”，即相互对立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容纳，以建立更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理论体系。因而，以道家为主导的《淮南子》，对儒家思想的吸收远远超过了其他诸家，清晰地反映了它在汉初由“尊道”到“尊儒”的思想演变过程中所具有的思想承转特色。

《淮南子》的思想特点是时代特点的折射，它在综合诸子思想基础上重构的理论体系则是对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西汉初年百废待兴，秦的速亡极大地震撼了汉初统治者，因此如何保障帝国的长治久安，成为摆在思想家面前重大的时代课题。在

其相当于序言的《要略》篇中，《淮南子》明确指出，它力求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的全部二十篇，归根到底是为了备“帝王之道”。这种经世图治的作书意图与汉初现实的政治背景，决定了《淮南子》是一部政论之书。笔者通过对全书的深入分析认为，《淮南子》的中心思想是“无为而治”，全书就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理论架构的。

为了表明“无为而治”是最为理想的治国之道，就必须从理论上对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作出系统论证；为了表明“无为而治”是可以实现的，就必须展开说明它的实际内容。这两方面构成了《淮南子》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在《淮南子》的整个理论体系中，“道”作为贯通宇宙、人生和社会的最高哲学范畴，为“无为而治”提供了形上的根据；“道”在自然、人性和人类历史中的落实则从不同层而为“无为而治”的必然合理性，作了理论的论证和经验的验证。通过这样一个“究天人而通古今”的论证过程，“无为而治”不仅成为人君所必须遵循的治世手段而且代表着最高的王道理想。《淮南子》用“因”的范畴，对“无为”进行了新的诠释，并以“因君势依法度”、“因臣资用众能”、“因民性得民心”、“因风俗行教化”为实际内容将“无为而治”层层落实，从而清晰地展现了它的以“道”为核心范畴，以“无为而治”为中心思想的体系结构，也全然应合了作者欲“纲纪道德，经纬入事”的作书宗旨。《淮南子》的作者们以满怀的希望将这部政论之书献给新即位的汉武帝，然而不久之后，他们便遭到了覆灭的悲剧性命运，他们的书也被“罢黜”。正如胡适先生所说：“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①

清代以来，出现了不少对《淮南子》的研究之作。但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偏重于对文本的注释与考订，从传统文化的大背

① 《淮南鸿烈集解序》。

景中凸现《淮南子》的文化精神和学术地位，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思想研究方面，也还存在一些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事实上，作为秦汉思想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淮南子》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在保存先秦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而且作为汉以后儒道哲学分化与合流的分水岭，它无论是对道家还是儒家的理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传统文化儒道互补基本格局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它在文学、美学、自然科学、军事、政治等层面，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它在历史转折时期所表现出的兼容与自由的文化精神，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互动，也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第一章 历史转折中的艰难诞生

——《淮南子》的成书

《淮南子》诞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新兴西汉王朝向成熟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迈进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它从此拉开了中国两千年来“大一统”国家繁荣昌盛的序幕。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结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学术发展由“子学”向“经学”过渡，各家思想逐渐走向整合，尤其儒道两家由争夺文化领导权发展至“独尊儒术”，使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正是在这种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在江淮这片传统文化的沃土上生长出了《淮南子》这朵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

一、社会转型

公元前 202 年 2 月，刘邦即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阳（今山东曹县附近），成为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是为汉高祖。其后经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四世至武帝即位，汉代的历史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这种转折意味着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确立，它的确立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是通过整个西汉前期社会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得以表现的。

西汉前期社会变化首先表现在社会经济由残破到繁荣的转变。汉是在秦所遗留下的一片中废墟开始自己艰难的创业之旅的。

秦的历史虽不长，但给社会民生所留下的创伤却是巨大的，而长达八年的战乱更使整个社会经济雪上加霜，因此到刘邦即位时，人口的散亡，社会物资的贫乏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样的困顿恐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汉初经济形势的严重性直接关系到其政权的稳定，因此，恢复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便成为汉王朝面临的重大问题。

高祖在称帝的当年5月，便颁布了著名的《罢兵赐复诏》，^①提出一系列恢复经济的具体措施如，“兵皆罢归家”、“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归农的吏卒“以有功劳行田宅”，“善遇高爵”等，从这些措施来看，一方面是为了促使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扶持和发展地主经济。确立以农为本正是这一恢复时期的根本方针，此后文景之世也基本是在这一基本路线下进一步提出强本节用，轻徭薄赋的政策。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二年下诏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十二年再次诏令租税减半，次年六月，则下令全部免收田租，直至景帝前元年5月，恢复三十税一，终西汉一世始终沿袭未改。为了让农民安心务农，不仅加在其头上的力役负担大大减轻了，汉王朝同时还推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史记·平准书》记载，“天下已定，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期，这一规定虽有所松弛，“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②到了文景之世，虽然在政治上仍坚持“抑商”的主张，但实际的经济政策却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在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颁布“除盗铸钱令”，也即允许私人铸钱，紧接着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四月又有“开关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史记·平准书》。

梁、弛山泽之禁”的决定，稍后又取消官府对盐铁的专卖，这些政策直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得到迅猛发展，一时间出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①的繁荣景象。

汉初以“休养生息”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措施经实践的证明是成功的。孝惠、高后时已有“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穡，衣食滋殖”的盛景，经文景之治，史所公认的安定时期，到武帝初即位，社会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然而汉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经济的率先发展，因为在高祖时就规定“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②而孝惠、高后时则基本主张“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③为了保证地方自治，中央还废除了秦朝设监御史监郡的制度，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吴国是当时地方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代表。吴王刘濞依据地利，用豫章郡之铜山得以铸钱，煮海水为盐，因此国用富饶。地方经济的这种发展无疑推动了全国经济的繁荣，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问题。其一就是地方诸侯富比天子的强大经济实力势必造成对汉中央政权的无形压力与威胁，因此，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其二就是大批暴富者的出现导致社会风俗崇尚“侈糜”，在习俗礼制方面出现严重的僭越，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遭到背弃。《史记·平准书》中揭露：“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放纵政策”，因此，到了武帝时代实行货币统一、盐铁专卖、均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史记·吴濞列传》。

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上的改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西汉前期社会的变化还表现在政治上由诸侯分封向加强中央集权的转变。刘邦以一介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政权，从而打破了过去“无土不王”的惯例，^①其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的平民身份使他在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一批与他有着同样野心的平民政治家。楚汉战争中刘邦之所以取得最后的决定性胜利，正在于他给了这些人以实现其野心的承诺。《史记·项羽本纪》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传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

由此可见，刘邦称帝后大封诸侯王实乃形势所迫，正如徐复观所言：“因为此种形势的逼成，所以在始封之时，即藏有杀戮之意”。^②果不期然，即位的第二年，刘邦便着手翦除异姓诸侯王，经历了约七年的时间，到公元前195年，除了长沙王因势力弱小得以幸存，其他均被镇压消灭。与此同时，他利用“同姓一家”的血缘关系开始大封同姓诸侯王，欲令其“犬牙相制”以收到“夹辅”的效果，从而保证汉王朝能坚若“磐石”。也有学者认为高祖

^①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第165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分封同姓王亦是出于形势所迫的无奈，因为异姓诸侯王翦灭以后出现政治上的虚脱地带，所以大封同姓是为了填补此种广大的政治虚脱地域，绝非仅是为了吸取秦亡的教训”，^①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不管高祖封同姓王是有意为之还是被迫无奈，大封诸侯不仅未收到他所理想的政治效果，而且恰恰因此造成其后汉初社会最为尖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到了文景之世，当年受封的年幼诸侯王都已“大抵皆冠，血气方刚”，^②而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大大发展了地方经济，诸侯国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天子，再加之高祖时规定诸侯国享有充分的统治权，在官制、财政等方面与天子相同。所以，此时的诸侯与天子几乎是平起平坐，甚至在许多方面出现僭越的现象。因此，文帝时代著名政论家贾谊就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以“割定地制”作为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具体措施，文帝虽一定程度上有所采纳，如在十六年“立齐悼惠王（刘肥）子六人、淮南厉王（刘长）三子皆为王”，^③但是对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吴国，文帝却不敢轻举妄动，虽然景帝还是皇太子时因下棋之事打死吴濞太子，致使汉朝与吴王有隙，但文帝对吴王采取了怀柔政策，“赐其几杖，老，不朝”，^④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汉中央政府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当到了景帝时代，在御史大夫晁错“削藩”的一再主张下，景帝终于对东部以吴国为首的几个富庶之国动手了，于是爆发了闻名史册的“七国之乱”。这场战乱是汉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最为直接的一次正面交锋，中央政府的最终胜利意味着汉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取得了极其关键的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第65～66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② 《新书·治安策》。

③ 《汉书·文帝纪》。

④ 《史记·吴王濞列传》。

进展。在平定了“七国之乱”以后，景帝不仅将齐、赵各分为六国，大大削弱其势力，同时对诸侯国的统治权趁机进行了无情的裁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綬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元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尉、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至此以后，诸侯王的行政权、军权、财权都受到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得了极大的压制，虽然在景帝时代，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却为武帝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继续以“大而化小”的手段削弱诸侯国势力，并颁布“左官律”、“附益法”以加强对诸侯王的防范，并在财政上限制其发展，诸侯国基本已丧失了其独立的权力与汉郡无异了。虽然形式上仍保留分封诸侯王制度，但实际上诸侯王成了“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①的“虚君”。中央集权政治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最后，西汉前期的社会变化还表现在“汉承秦制”向“为汉立法”的转变。秦始皇称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为了论证这一帝国建立的神圣性与合理性，秦始皇利用了战国以来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并以此为据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说：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① 《汉书·诸侯王表》。

然而，秦不旋踵而亡，及至刘邦即帝位，自以为获水德之瑞，于是仍沿用秦之正朔和服色。然而这样一来，就存在两个问题。如果承认秦为水德，那么汉与之同德是不符合“五德终始说”的。如果不承认秦为水德，认为汉是直接继周之火德，那么秦这一段历史就无法“安顿”。因此，到了文帝时候，就掀起了一阵“改制”的浪潮。最先提出改制的是贾谊。《史记·贾生列传》中载：“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贾谊承认秦为水德，汉灭秦当继为上德，并提出一整套的“土德”制度，然而因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再加之一班老臣对贾谊的嫉妒陷害而告吹。到了文帝十四年左右，公孙臣又提出汉应改土德，并预言有黄龙的符应出现，但他的主张遭到当时丞相张苍的反对，张苍坚信汉为水德，并以河决金堤为水德的符应。谁料在文帝十五年在成纪这个地方果然发现了黄龙，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为博士开始商议改制的事情。这时又出了一位新垣平，他“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①第二年还献上玉杯以促使文帝的改制，文帝果然改元年，并“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做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然而，后有人告发新垣平的欺诈行为，及至新垣平被杀，文帝也就“急于改正朔服色”。至此，文帝时期的“改制”运动算告一段落。景帝时代，史无改制这一方面的记载，不好妄下断语。总之，虽然汉定德改制在这一时期并未能最终实现，但以土德代水德，为汉重立新法已成为大势所趋。武帝即位当年便召赵绾、王臧等商议立明堂、封禅改制之事，虽然，因窦太后的阻挠而暂告失败，但窦太前一死，武帝举贤良，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及太初元年正式宣布改制，定汉为土德，“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

^① 《史记·封禅书》。

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①

以上三方面虽并不足以概括西汉前期社会变化的全部内容，但它们至少是在最主要的方面显示出文、景、武时代的社会变化与转折。这一转折在文帝时代可谓是一个酝酿阶段；景帝时代可谓是一个发生阶段；武帝时代则是一个最后完成阶段。《淮南子》的作者刘安一生恰恰经历了这三世，因此，他是这一时代转折的历史见证人，由他主编的《淮南子》一书深刻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的特点。它一方面对新兴帝国寄予的无限希望而大加颂扬，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它一方面表达出为汉帝国提供“长治久安”治国之道的雄心，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地方诸侯面对中央政权步步紧逼下的无奈；它一方面主张变更法度礼制以应时而化，但另一方面又以“因循”为根本的精神归旨。在全书中，积极与消极，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矛盾交错形成《淮南子》思想的多面性甚至前后的不一致性，这其中固然与出自多人之手、杂采百家思想有关，但归根到底是特定时代特点在《淮南子》中的折射。

二、儒道争胜

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为黑暗与残暴的一幕。因此汉的建立不仅是在经济的废墟之上，亦是在文化的废墟之上。历史的巧合恰恰在于汉初的开国皇帝刘邦本人出身贫寒，根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的追随者们也大多出身草莽，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无建树。因此，注定汉王朝在文化的重建中有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初由对黄老的尊宠到儒术的独尊，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思想

^① 《史记·封禅书》

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道家思想能在汉初社会独领风骚绝非偶然。首先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连年的战争使人民流离失所，身心的疲惫都已到达极限，因此整个社会心理有“思静求定”的要求；其次，如前文所说，经济的恢复是汉初压倒一切的主题，“休养生息”的客观经济形势为道家学说登上汉初的政治舞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三，从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来看，由于秦奉法家思想为圭臬而一任酷法，导致不旋踵而亡，汉初普遍有一种反法的思想倾向，而秦的焚书坑儒又使儒家遭到重创，再加之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内绝大多数人起自文化素养不高的平民阶层，（除韩信乃故韩襄王之后算是贵族）他们在潜意识中有反贵族、反传统的因素，对儒家所谓的诗书文化不仅不感兴趣，甚至是持蔑视的态度。刘邦尤其不好儒生，“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①他的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汉初统治思想在最初的选择上自然地排除了儒家。正是这诸多条件的因缘聚合，使得道家思想一跃成为汉初六十余年的主要统治思想。但这时的道家主要是指兴起于战国中晚期的黄老道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而又“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关于黄老道家，长期以来由于史料阙如，学界对其认识一直较为模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帛书，其中《老子》有两种写本（甲、乙本），其中尤以抄写在乙本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最为引人注目。虽然目前学界关于这四篇的名称、产生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尚有争议，但由于它们是汉代抄写的，因此作为汉代黄老道家研究的史料是不容置疑的。从这四篇的主要特点来看，完全符合司马谈所论的道家，其内容中道法融合的特点亦非常突出。正如一些学者

^① 《史记·酈生列传》。

指出，黄老有主张清净无为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强调法治的严酷一面。^①由于黄老将道家与法家巧妙有机地结合，使其成功地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之中，而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成功反过来又推动它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当时以黄老术为治道而取得成功的著名丞相是曹参，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相齐时“其治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代萧何为相，一遵萧规，“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守一。”^②在最高统治者中，文帝“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文帝的皇后窦氏则有着近乎宗教狂热般的对黄老的推崇，史称“窦太后好黄老、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③与此相映成趣，在学术领域则出现了一大批以黄帝为依托的道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记载道家有黄帝书四种七十八篇，另《史记·乐毅传》中还记有黄老之学的传承：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这条关于黄老学传授关系的最具体的资料中，河上丈人、安期生、乐臣公和盖公都是战国末秦汉初的著名隐士，随着他们的主张得到西汉政权的有力支持，黄老之学一时成为汉初“显学”，史载当时的黄老学者还有司马季主、郑当时、汲黯、王生、黄生、司马谈、邓章、安丘生等。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并不压抑其他各家的的发展，尤其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继秦而来的“挟书律”，即废除私家藏书的禁令，高后元年（公元前187

①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② 《汉书·曹参传》。

③ 《史记·外戚传》。